

革命、海尔维第共和国、调解时期与复辟—— 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798 年 6 月 5 日，法国士兵打开了苏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下方的金库——行会共和国一直在此存放其铸币储备——并将其中的财物搬走。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它终结了这座城市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财政审慎传统，而这一传统曾被欧洲各地的同时代人视为一个治理良好的新教共和国的标志之一。三十多年后，1830 年 11 月 22 日，约一万名来自苏黎世乡间的男子聚集在乌斯特（Uster）上方的一座山丘上，要求制定一部城市不再统治乡村的宪法。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发生了法国入侵、在苏黎世城内及周边进行的两场战役，以及一个试图以税收取代什一税却以失败告终的单一制海尔维第国家。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由拿破仑钦定的宪法、一场以处决告终的农民起义、贵族统治的复辟，以及最终的一场自由主义革命——它赋予该州一套法律秩序，其现代经济和金融机构正是在这一秩序下成长起来的。¹

本章追踪苏黎世的财富和制度在这一连串动荡中的命运。本章论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仅限于政治决定了谁可以拥有财产、从事贸易、放贷和征税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个金融中心而言，1794 年至 1839 年这几十年在一个确切的意义上具有奠基性。它们瓦解了旧商人贵族赖以积累财富的法律特权，首先是城市市民在贸易和

制造业上的垄断。它们开启了将土地上的封建负担折算为货币并予以清偿的漫长进程，从而创造了现代信贷体系所需要的、无负担且可抵押的财产。它们将公共财政的基础从什一税和地租转向税收。在拿破仑封锁的压力下，它们催生了第一批机械化棉纺厂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机械工程企业，同时还造就了一个自由派实业家阶层，而正是这些人创办了下一代的银行。此外，它们还在1831年赋予苏黎世一部明文保障贸易自由和财产不可侵犯的宪法。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主题，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1798年以前，苏黎世是一个城市国家：一座约一万一千居民的城镇的市民，统治着一片拥有一十八万余名臣民的领土。² 城市的财富部分建立在将农村企业家排斥在最有利可图的商业形式之外的特权之上。这一时期几乎每一场冲突——从1794年的施泰法备忘录（Stäfner Memorial）到1830年的乌斯特集会日（Ustertag）——都围绕着这一关系展开。以法律平等为方向解决这一关系，为金融中心所在的现代州开辟了道路。与日内瓦的比较（见本书姊妹卷）颇具启发性：日内瓦于1798年被法国吞并，作为法国的一个省经历了革命时期；而苏黎世则是作为一个瑞士国家的成员度过这一时期的，该国家的形态在三十三年间变更了四次。本部分前面几章描述了包买制与商人银行家（第C.I章）以及国家投资机构 Leu & Co.（第C.II章），而瑞士法郎和1848年的联邦国家则在第C.IV章中论述。

1 注释

1. Staatsarchiv des Kantons Zürich（编），Kleine Zürch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18–2000（苏黎世：Chronos，2000），第35页，https://www.zh.ch/content/dam/zhweb/bilder-dokumente/themen/politik-staat/recherche-im-staatsarchiv/z%C3%BCrcher-geschichte/zh_verfassungsgeschichte.pdf。该文指出，第一批法国军队于1798年4月27日进入苏黎世，国库于1798年6月5日被强行从大教堂金库中搬走。

2. Wikipedia（德语版），“Verfassung des Kantons Zürich”，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erfassung_des_Kantons_Z%C3%BCrich，其中给出约 1803 年城市约有 11,000 名居民、乡村约有 182,000 名居民。

2 结语

革命时期摧毁了旧苏黎世，并为新苏黎世创造了条件。1794—1795 年的施泰法事件（Stäfer Handel）表明，因纺织贸易而致富的农村精英，不再接受一部将其排斥在政治和最有利可图的商业形式之外的宪法。1798 年法国入侵夺走了国家的现金储备之后，1799 年的战争又以征用和破坏的方式消耗了远多于此的财富。海尔维第共和国废除了城市的特权，宣布赎买封建负担，并试图建立一个现代税收国家和统一货币，但因缺乏资金和民意支持而失败。调停时期（Mediation）将该州恢复为一个由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国家，将州的财产与城市的财产分开，并以处决镇压农民起义，强制推行什一税的赎买。在拿破仑封锁的保护下，第一批机械纺纱厂以及 Escher Wyss 的机械工程企业相继创立。复辟时期使城市重新取得政治主导地位，却无法恢复其经济特权。与此同时，以 Heinrich Kunz 等企业家为代表的农村新兴工业财富，已发展到城市无法控制的程度。

1830 年 11 月 22 日的乌斯特集会日和 1831 年的宪法，以法律平等为方向解决了城乡之间的冲突，并在宪法中明文保障了苏黎世的贸易自由、财产不可侵犯以及赎买封建负担的权利。1830 年代的自由派政府改革了法院，创办了大学，拆除了城防工事，并保护新机器的所有者免受焚烧机器的织工侵害。1839 年的“苏黎世政变”（Züriputsch）中断了自由派政权，但并未推翻其经济安排。到 1848 年苏黎世加入联邦国家之时，它已具备了法律秩序、工业基础、新的企业家精英以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金融中心正是由此成长起来的。

3 五句话概要

1. 1794 年的施泰法备忘录及其在 1795 年遭到的严厉镇压，表达了富裕农村精英对政治平等、贸易自由和废除什一税的诉求，并为 1798 年 2 月城市统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2. 1798 年法国入侵后，苏黎世约 622,000 里弗尔的国库于 1798 年 6 月 5 日被从大教堂金库中搬走；此后，占领以及 1799 年的两次苏黎世战役所带来的征用和破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额。
3. 海尔维第共和国终结了城市市民的商业特权，暂停征收什一税并下令赎买，并试图以现代税收取代封建收入、以瑞士法郎取代各州铸币，但均未成功。
4. 1803 年的调停法案将苏黎世恢复为一个由财产所有者治理的州，在州与城市之间划分公共资产，镇压了 1804 年因什一税赎买而爆发的“博肯战争”（Bockenkrieg），并在大陆封锁的保护下见证了第一批机械纺纱厂的创立——Hard 纺纱厂（1802 年）和 Escher Wyss（1805 年）。
5. 自 1814 年起的复辟时期使城市贵族重新掌权，此后 1830 年的乌斯特集会日和 1831 年的宪法确立了法律平等、贸易自由和财产不可侵犯；而 1830 年代的各项改革——从高等法院（Obergericht）到 1833 年的大学以及 1836 年的 Bank in Zürich——为现代金融中心奠定了制度基础。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revolution-helvetic-republic-mediation-and-restoration-overview-and-summary